

BEIJING CHENGREN GAODENG JIAOYU

#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

主编：尤文 贺向东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

尤 文 贺向东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尤文, 贺向东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1119-297-1

I. 北… II. ①尤…②贺… III. 成人教育: 高等教育—概况—北京市  
IV. G729.2 G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1740 号

BEIJING CHENGREN GAODENG JIAOYU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

尤文 贺向东 主编

---

责任编辑 张慧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 @ 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526 千

定 价 65.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 前 言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全国文化教育中心，是一个有着三千四百年历史的文明古城和一千三百年历史的文明古都。

北京自古以来崇尚教育。春秋战国时期，它是燕国文化中心，后历代发展教育，至辽入关后，设国子监。金朝迁都燕京，国子监规模扩大，开科取士，进一步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元朝承传唐宋以来的科举教育制度，大都文化教育昌盛，国子学是全国最高学府。明朝迁都北京后，大兴教育，广设学府。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国子监，监生最多时曾达万人。还有太医院、钦天监、四夷馆培养医学、天文历法和翻译人才。清朝在北京定都，承继唐宋元明教育制度。清初，中央设国子监，统管下设的国子学、太学等中央官学，是国家最权威的高等学府。清政府各主管部门还设有律学、书学、算学、医学、武学和画学等不同类型的高等学府。

北京长期处于都城地位，古代成人高等教育发达。隋唐以来，实行科举教育制度和多种学科教育，开科取士，提倡和鼓励自学成才。

在奴隶社会，主要官职都是世袭的。进入封建社会，逐渐采取选拔官吏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时，选拔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由地方政府进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标准，全凭门第出身。于是，名门望族子弟被选为上品作高官，庶族寒门出身的人只能被选为下品小官，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

随着封建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庶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不断加强，人数不断增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的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地位，而按门第高低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堵塞了他们进入仕途的道路。加上这种制度容易造成世家大族长期操纵地方政权，称霸一方的弊病，因而越来越不适应封建王朝的统治利益。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杨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地主阶级的政权基础，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规定各州每年以德才兼备为标准选拔三人，推荐给朝廷。后又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等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荐举

人才。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设置了进士科，国家用考试的方法以才取人，考中的考生就可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中做官。这就是我国科举教育制度的开始。

科举教育制度，就是以德才兼备的成年士人为对象，由地方政府向朝廷推荐，国家设立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古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这种做法，也叫做“开科取士”。

创置科举教育制度，是我国古代培养国家治理人才，选拔官吏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适应了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为封建社会各个阶层加入统治集团开辟了道路。隋朝实行的科举教育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封建朝代所沿用，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封建王朝培养国家人才、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和隋朝以前的选官制度相比较，是一个最为公开、公平、公正的培养选拔国家人才制度。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科举教育制度始于隋，完备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终于清末，在中国各个朝代实行了1300余年，它的存在曾对中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北京作为元、明、清的首都，国家考试院——贡院设在京城，全国各州考生云集于此，是国家科举考试基地。随着科举教育考试制度的推进，北京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古代成人高等教育中心。

实行科举教育制度，开科取士打破了豪门垄断官选，这种具有平等竞争性的培养、选拔人才制度，自隋朝以来特别是明、清以后一直被当作国家的拔才大典，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检阅历朝皇帝实录，几乎都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组织和主持考试事宜。为了保持科举考试的庄重性、严肃性及其正常顺利进行，还指定专门的机构对考试进行严格的监督，一旦发现舞弊行为，立即纠参，由皇帝颁发谕旨，飭派大臣查办。若纠参属实，按律治罪，决不宽恕。在清代，考官因私舞弊，违犯科试条规，重则斩首，轻则流放、革职；至于考生，则革除名籍，永远开除士列。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科举教育制度，开科取士，是因为这一制度有利于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隋唐以后，实行开科取士，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士人能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通过严格考试入选为官吏，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从而使科举选考成为巩固皇权的工具。皇权通过科举教育制度在民间创造了新的统治力量和赖以支撑的阶级基础——士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随着科举教育制度的推行，这个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队伍就越来越大，有力地巩固了封建统治。

科举教育制度是我国古代成人高等教育的一大创举。它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科举考试不再唯门第、财产是问，更加注重士人的知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性，从而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由于科举考试程序的相对严密和应试对象的全民性，平民家庭出身的较之前者，其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因而所下工夫往往更多。“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其获隽的机会相对较多。可以说，从唐至清，科举教育制度一直是促进社会下层士人向上层流动，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从成年的士人中不断的定期的开科取士，使得士人阶层不停地吐故纳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家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饱学之士进入国家官僚队伍，可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来自社会下层，了解民间疾苦和吏治利弊得失，在施政时能给僵化的官僚体制增添生机，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腐化，抑制腐败。因为，他们通过书院，或私塾，或自学，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掌握治理国家的有关理论知识，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也使国家官僚队伍保持较高的治理水平，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追溯我国封建社会漫漫绵延的历史原因，与科举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官僚政治在社会中化解了很大一部分矛盾乃至对抗是不无关系的。

科举教育制度具有一定的文化统制与文化普及功能。由于每次考试录取的名额有限，所以，这一阶层中除了小部分入仕从政、参加社会流动外，绝大多数仍滞留于社会下层，成为民间文化教育的传播者。

古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即科举教育制度绵延1300多年，它作为一种培养、选拔国家治理人才的方法不失其合理性。科举考试的组织，严格的考场纪律，试卷批阅中誊录、复审、磨勘、落卷的搜集等严密的程序，对于舞弊行为的严肃惩治等等，这些都是无可非议和不能否定的。由于每次中额人数有限，“非学而优”者不能入选，因而在全国各地造成一种好学上进的良好社会风尚，凡经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的士子，毫无例外地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尽管科举教育制度在清末废除，科举功名的社会价值并未丧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会的垂青。“金科状元”至今还在称颂。

科举教育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弊病，它所革除的只是陈旧过时的考试内容、八股文体和为封建君主专制政治选才的宗旨。长期实行科举教育制度，曾为传统中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在民间对民众的吸引力巨大，它使皇权与绅权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中国社会也因此保持

秩序的长期稳定，对维护中央集权国家统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科举教育制度的废除，虽然摧毁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但是士绅阶层的瓦解，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界限更加固定，对社会的整合功能造成消极影响。由于科举教育制度废除后，社会没有适时地提供替代性的新型的培养、选拔人才制度，导致社会上下层流动中断，从民间成年的个人自学者中选拔人才的良好局面不复存在。

由于，科举教育制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制度，其自身的局限性，日益成为社会思想进步、文化教育发展的障碍。进入20世纪初，废除科举教育制度，寻找新型的培养、选拔人才的教育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教育革命，带有方向性的教育变革，对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是，对科举教育制度的历史功能作用，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具有现代意义的成人高等教育，是伴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生而新兴起来的，迄今不过130年的历史。在北京，现代成人高等教育，始于清朝末年，比发达国家大城市起步晚、发展慢，只是100年来的事情。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戊戌变法的推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与社会大变革、工业大生产直接相联系的成人高等教育，在北京缓慢地萌生出来。洋务派打出自强旗号，提出向西方学习，“中学为主，西学为用”，企图通过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兴办培养高技术、高管理人才学校，“师夷长技以制夷”，实现救亡图存，达到自强的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加快了清政府变更教育制度的步伐。《清史稿·选举志二》指出：“自五口通商，英法联军入京，朝廷鉴于外交挫衄，非兴学不足以图强。”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同治六年（1867年）初，在同文馆设天文馆、算学馆，招取科甲正途官员入学。同文馆建立招生，标志着现代成人高等教育机构萌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并举行招生考试，先招考速成科学员。仕学馆考生，由各衙门推荐；师范馆考生，由各省选送。同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校教育制度，史称“壬寅学制”。次年，修改“壬寅学制”。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不仅对小学、中学、大学堂作出规定，还对实施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也有明确规定，在职人员职业技术教育引起重视，写进了国家教育制度。

1902年至1906年，京师大学堂相继设立仕学馆、进士馆、夜师范传习所和法律学堂、高等警务学堂等成人高等教育机构，招收有功名、有官职的成人知识分子和教师以及30岁以上、40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入学，进修深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月，刑部设立法律馆，即令会满汉司职人员学习案例，并参读外国法律。同年5月，在京师设立法律学堂，招考各种科属司职人员住院进修，毕业的派往各省。法律学堂规定，本科3年毕业，速成班1年结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京师大学堂新开女学讲习所，招收妇女入学，其中一个班招收年长妇女而未入学者，专习初级师范，实为女教师进修班。与此同时，译艺女学堂、艺学馆等进修性质的学堂也相继建立起来。为解决北京师资数量少、质量低的问题，相继设立内、外城夜学师范传习所，规定各学堂教师中未习师范者及私塾教师入所补习。同年10月，京师建立高等警务学堂，设本科、专科和简易科，学制分别为3年、1年半和3个月。1914年至1917年，交通传习所附设军官铁路讲习班，学制3年，28名学员全部毕业。这标志着北京成人高等学校教育，在清末西学东进的浪潮中初露端倪。

辛亥革命后，民主思想活跃，新文化运动兴起，为北京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为适应民主革命的需要，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领导建立高等法文专修馆，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业余法文夜校，开创我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成人高等教育之先河。

1935年，北京市立社会教育人员养成所成立，培训社会教育人才，教学内容不仅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美术等示范性课程，还专门开设了民众教育概念、民众教育事业及实际问题、教育心理学等从事社会教育的师资所必需知识。

由于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北京长期处于封建王朝都城地位，皇权思想、贵族意识严重，长期闭关锁国，讲究门第血统，轻视科学技术，把应用科学、实用技术视为“圣人不屑”的“雕虫小技”、“奇技淫巧”，不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依附于自然经济和农业生产，现代工业难以发展，基本上没有发展现代成人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基础。

况且，自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长期处于战争年代。民国时期更是战争不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工业发展困难，国民党政府把钱用来打内战，无心办学。北京高等教育办学条件极差，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办不起来。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办过成人高等教育，可是那时只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办学，教学只能服从革命与革命战争的需要，教学内容以政治教育、军事教育为主。且学校及培训机构不稳定，流动性



很大，开办一段以后，就停办，或迁移，或与其他学校合并，来不及学校建设。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北京，现代成人高等教育不可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于是，在古都北京，具有现代意义的成人高等教育，从20世纪初年就开始孕育、萌发，可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半个世纪过去了，也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1949年春，北京和平解放，建立人民政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华大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工农劳苦大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解放，还在文化教育上也成为真正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推进，在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进程中，在教育为人民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指引下，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社会主义成人高等教育，在北京迅速崛起，并在艰难曲折中发展、壮大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北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60余万高级专业人才，培训了数百万干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极大地提高了全市市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北京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首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成人高等教育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在首都社会主义教育史上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b>第六章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的辉煌成就、宝贵经验和发展趋势</b> .....	(398)
<b>第一节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的辉煌成就</b> .....	(398)
<b>第二节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b> .....	(414)
<b>第三节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b> .....	(429)
<b>附 录</b> .....	(439)
<b>附录一 北京市成人教育历届组织机构及负责人情况</b> .....	(439)
<b>附录二 北京成人高等学校</b> .....	(445)
<b>附录三 1998—1999 学年度北京成人高等教育统计资料</b> .....	(453)
<b>本书主要参考资料</b> .....	(460)
<b>后 记</b> .....	(462)

# 第一章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的开基和创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古老的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伴随着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社会主义成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工程也拉开了序幕。

## 第一节 北京成人高等教育的探索起步

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社会主义成人高等教育发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年，当时被称为北京工农业余高等教育。解放初，北京成人高等教育混同于普通高等教育之中，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或者附属，没有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体系。解放后，北京成人高等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以产业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为主要培养对象的，以业余形式为主的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过程中，党和人民政府就率领人民群众开始了对适合国情、市情的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思路、办学方向、办学方针和办学模式的探索。那时，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起步，在起步中开拓出北京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路。

### 一、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方向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国家性质决定了新中国的北京成人高等教育，面向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新中国初年，帮助工农劳苦大众文化翻身，提高文化程度和文化素质，不仅是人民政府极为重要的教育任务，而且是人民政府极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号称文明古都的北京，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文化上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更不可能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据1949年统计，北京城区职工80%以上是文盲，

8%为小学文化程度，仅有4%达到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的不多，大学文化程度的极少。郊区农民90%以上是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一个村没有几个。当时，劳动人民文化素质低，成为北京人民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一大障碍。劳动人民政治翻身、经济翻身，文化不翻身，还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北京文化教育的落后，文盲充斥的现实，既是旧北京教育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也是新北京教育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新北京教育必须下大力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进行大规模的扫盲教育，还必须满足那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工农群众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建设人才。

新中国建都北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中央各部委集中在北京，大批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涌进京城。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却缺乏管理现代国家、管理大城市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知识和本领。加强革命队伍建设，进行干部教育，发展工农业余高等教育，把大批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加速培养成为懂管理、会建设、善领导的高级专门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同时，留用的原北平国民政府旧工作人员和学校、社会各界的旧知识分子，要为新北京建设服务，也必须对他们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有待于加速发展业余高等教育。

## 二、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方针的确立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纲领。《共同纲领》中关于文化教育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共同纲领》中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是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总政策和总任务，也是北京业余高等教育创立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依据。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要使工农劳动大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解放，更要在文化教育上得到翻身解放，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造旧教育的计划、步骤和建设新教育的方向。教育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经验，特别是要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教育要以普及为主，除维持原有学校外，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会议着重指出，我们的一切教育工作，应该从文化、科学与政治上不断地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水平，加强工农的联盟及其建设和创造的力量。会议特别提出，要积极创办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大办工农业业余文化补习学校。高等教育以培养结合生产经验与生产技术的各种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生产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之本，新教育应当注重发展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并将这种教育与国家生产建设的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使教育有计划地配合生产建设，真正为国家建设服务。

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到会。马叙伦部长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现在把工农教育问题作为国家教育工作主要的议事日程，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空前的大事。”“我们所指的工农教育，主要的是指在生产战线上的广大青年、成年男女工人和农民的教育问题以及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是属于一个新的教育范畴的。”为了大面积地培养革命工农干部，还制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工农文化补习学校实施办法方案》，一个是《工农速成中学实施办法方案》。这两个方案的实施，使大批出身工农的干部得到文化教育的洗礼，并使他们成为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可靠的政权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业业余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已经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951年制订的新学制中，成年人的业余教育已占有重要地位。1951年8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第97次政务会议讨论《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时，明确指出：“成年人的教育，包括工农的教育，失业人员的教育，老知识分子的教育，老干部的再教育，都需要在我们的学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必须在教育观念上来一个转变。过去的传统只为青年人办学，只讲正规化，……现在这种观点要改变过来。我们的学制也要适应成年人的学习要求，给他们受教育

的机会。”(周恩来:《重视成人教育,培养建设人才》,《周恩来选集》第35—3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

同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国原有学制即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有许多缺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农民和干部学校,各级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没有应有的地位,……这些缺点亟须改正。在目前,全国学制的完全统一虽然还有一些困难,但是确定原有的和创新的各类学校的适当地位,改革各种不合理的年限与制度,并使不同程度的学校互相衔接,以利于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工农干部的深造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促进,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政务院以政令的形式确立了成年人的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在新学制中就有关于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级各类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规定,而且这种工农业余学校不是占次要的地位,而是和其他各种学校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新学制中的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级各类工农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学制中是没有的,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学制也不完全一样。这表明新中国一成立,成年人的教育在整个人民教育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还有中国独具的特色。同时表明,各级各类工农业余学校起步就纳入国家学制,朝着正规的办学方向发展。

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工农业余教育,建立管理机构,组织各方面力量,积极探索办学思路。北京市早在1950年3月16日就建立了业余教育委员会。由副市长吴晗兼任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市教育局局长翁独健、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莱夫、市妇联副主任张晓梅为副主任委员。在北京市业余教育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就举办业余教育的目的、方针、方法和前途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办业余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人和干部的文化水平,而且要从工人中培养工程师和技师,使工农出身的干部提高工作水平。办业余教育要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办业余学校要进行试点,成功后要推广。业余教育的前途不会是悲观的,但可能有一些挫折。有了缺点、错误,要追究分析原因。要办好学校,需要党派、政府、群众团体、业余学校合力来办。办学校先生和学生一起管,教员随时征求意见,改进教学方法,这是很重要的。

### 三、成人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对工农业余高等教育办学模式进行了

积极探索，试办了各种办学模式，并从实践中作出了选择。

### （一）举办政治学习活动

解放初期，北平人民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严守纪律，丝毫不犯，待人和蔼，帮助群众；看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民执政，联系群众。他们与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人员根本不同，人们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于这种革命精神，各阶层人民衷心敬佩，迫切地要求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学习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学习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长远理想和当前目标。人民群众要求学习的强烈愿望，完全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共北平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对此给予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和组织领导。

1949年4月13日，中共北平市委作出了《关于普遍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组织劳动人民政治学习，开展政治学习活动，提高劳动人民政治觉悟，特别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组织性，则是完成生产这一中心任务的关键。因此，必须有计划地、有系统地组织和领导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党员群众的政治学习，广泛地开展理论与政治学习活动，以提高其社会科学知识、革命理论知识和政治觉悟，提高其建设新北京的奋斗意志和工作能力。《决定》指出，政治学习的目的在于要求广大工人群众及知识分子解决下列几个问题：1. 确定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树立新的劳动态度，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2. 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3. 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及党的各种具体政策；4. 学习、掌握、熟悉本行业务知识，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学习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贯彻“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方针。

为了推动和指导学习活动，市委成立学习委员会，对工人群众的政治学习、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政治教育、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以及新党员教育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规定了具体的学习内容。工人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以及党的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主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略》、《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理论著作。在职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的《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12种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当时称作《干部必读》），依其政治、文化、理论水平分成高、中、初级三种班，中、初级班可学习其中几种书籍。



当时，市委高度重视工人的政治学习，解放后，就立即在各厂矿、各区组织业余学习。1949年5月起，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举办了职工政治培训班，培养企业职工中的积极分子。到1951年上半年，先后办了6期培训班，培训学员2311人。1949年暑期，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与有关单位共同组成暑期工人教育委员会，从各高等院校动员进步教师、学生到18个私营企业和11个区，向1.2万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主要是唯物史观的教育。在“五反”运动中和运动后，在私营企业职工中，进行以“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为专题的大讨论，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青年学生，除校内教育外，1949年7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筹备委员会等单位举办了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对1934名团员和青年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的政治学习受到重视。1949年3月，北平市中小学教师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办了星期日专题讲座，请艾思奇、邓拓等人讲课。6月，中小学教师联合会正式成立，当年暑假就与市教育局共同举办了历时一个月的暑假讲习会。当时，政治学习形成热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过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工人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起新的劳动态度；在职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大量新干部树立起革命人生观；知识分子开始掌握社会科学知识，树立起唯物史观，也提高了政治觉悟。

1951年9月起，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教师进行了思想改造的政治学习活动。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的邀请，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有北京、天津两地高等学校教师达3000余人。周恩来就知识分子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七个问题谈了个人的想法，并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认识思想改造讲了自己的体会，给教师们很大启发。此后，一个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实际，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推动教育改革的学习活动，在京津两地各高等学校展开。

这是一次引导和帮助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的政治学习活动，对于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转变立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实现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这种政治教育和政治学习活动，发展成为一种正常的成人高等教育活动，对推进全市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对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首都各项城市建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